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

1977-1980

中国经济的发展

李成瑞 张卓元

人民出版社

F120

38

1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I

1977-1980

中国经济的发展

李成瑞 张卓元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7—1980)

(1)

中国 经济 的 发 展

李成瑞 张卓元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 印张 38,000 字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198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7,900

书号 4001·413 定价 0.16 元

目 录

一、国民经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巨大损失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 1

(一) 人口增长迅速, 经济发展缓慢 3

(二)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5

(三) 人民生活大量“欠帐” 8

(四) 国家财政发生赤字, 经济效果大大降低 10

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比例失调的继续加深

——1976年10月到1978年底 14

(一) 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措施 14

(二) 1977、1978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8

(三) 1977、1978年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4

三、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及其

贯彻执行

——1979年初到1980年底 31

(一)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 31

(二) 实行调整方针的政策措施 34

(三) 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继续发展 43

(四) 1979、1980年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8

(五) 1980年年底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调整 50

后 记 58

一、国民经济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遭到巨大损失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

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一个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的新时期。

我们要考察1977年至1980年经济的发展，需要首先对在此以前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进行简单的回顾，分析一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经济工作面临着怎样的情况，当时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进程。当时对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在政治上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错误的斗争方法；在经济上，进一步实行左的错误政策和做法。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江青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他们“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妄图从根本上毁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掌握的国家政权，使全国重新回到人民所厌恶

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黑暗局面。他们给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大批领导人，硬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把人民手中的国家机器作为“彻底砸烂”的对象。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基本适应的方面，竭力鼓吹反动的平均主义，鼓吹“浪费有理”论，鼓吹脱离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和客观需要的“穷过渡”。他们还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所有这些，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生产的极大破坏，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抵制和斗争，使他们的破坏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经济上的破坏与反破坏此起彼伏，生产的上升与下降交替出现。由于林彪、江青之流对经济的严重破坏，再加上久已存在的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思想的发展，

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的损失和挫折。

下面，让我们考察一下十年内乱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概略情况。

（一）人口增长迅速，经济发展缓慢

我们先谈谈十年中人口和国民收入的变化情况。在谈到这些情况以前，需要说明一下：十年内乱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统计工作的严重破坏，影响了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某些数字是有一些“水分”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统计数字中看出基本的趋势和特点。

这十年中人口增长是很快的。1966年人口的增长率是2.3%，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政治动乱，政府的各种机构包括计划生育指导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人口增长率进一步上升。1967年到1971年人口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2.7%，五年共增加人口10,57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00多万人。1972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有所恢复和加强，人口增长率才逐步降低，从1972年的2.3%下降到1976年的1.4%。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经很大，每年仍增加近1,700万人。十年共增加1.9亿人，相当于一个日本加一个法国的人口总数。全国人口总数从1966年的74,206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93,267万人^①，平均每年增长2.3%。

与此同时，这十年中经济发展却十分曲折，呈现出下

① 本书所列举的全国数字，均未包括台湾省数字。

降——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反复斗争的结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国民经济的破坏，造成损失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67年和1968年，他们到处夺“走资派”的权，“踢开党委闹革命”。谁要是抓生产，就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把他打倒。结果，使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再下降4.2%。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广大人民的坚持斗争，从1969年到1973年这五年间，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生产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4.8%（按可比价格计算）。除了1972年由于气候不好，农业减产之外，速度是不慢的。但到1974年，以江青为头子的“四人帮”发动了第二次大破坏，他们大搞所谓“批林批孔”，反对“复辟势力”，谁要抓生产，就扣上“儒家党”的帽子把他打倒。结果，使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下降到1.4%，其中，工业净产值比上年下降0.9%。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坚持正确的方针路线，获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农业总产值上升11.9%。为时不久，“四人帮”在1975年末发动了第三次大破坏。他们大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批“唯生产力论”，谁要抓生产，就攻击他是“为走资派涂脂抹粉”。这次损失更为严重，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下降为1.7%，其中工业净产值下降5.3%，财政出现大量赤字。

总的来看，十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很缓慢的。按可比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十年间平均每年增长7.1%，大大低于1952—1966年平均每年增长10%的速度。新增加的国民收

入^①，大部分用来抵充新增人口的消费。全国每人平均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只增长2%多一点。如果考虑到统计数字中有某些不确实的成分，特别是考虑到有相当数量的不对路、不合格的产品也计算了产值和国民收入，那么每人平均国民收入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有些年份甚至是有下降的。

（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我们不仅要考察工农业总产值和每个人平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且要进一步考察国民收入是怎样构成的，看看国民经济的结构是否合理。

事实证明：在同样的经济水平之下，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同，会导致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状况的很大不同。请看下页表。

从这个国民收入的构成表中可以看出，农业的比重从1966年的43.6%降低到1976年的41%；工业的比重，从1966年的38.2%上升到1976年的43.3%。如果把工业净产值作为100，那么，轻工业净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66年的47.2%下降到1976年的40.4%；重工业净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66年的52.8%上升到1976年的59.6%。这就是说，农业、轻工业更加薄弱，重工业过重的现象进一步加剧（在重工业内部还存在能源工业薄弱、机械工业片面发展的问题）。建筑业净

① 本书所称国民收入，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五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收入。

1966—1976 年国民收入构成的变化 (%)

	1966年	1976年
国民收入合计	100	100
工 业	38.2	43.3
农 业	43.6	41
建 筑 业	3.7	4.9
运 输 业	4.2	3.8
商 业	10.3	7.0
在工业净产值中轻重工业比例		
轻 工 业	47.2	40.4
重 工 业	52.8	59.6

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 1966 年的 3.7% 上升到 4.9%，这主要是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引起的，而基建投资，主要是重工业投资，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重是下降的，民用建筑投资比重下降的幅度更大，许多地方新住宅的建设抵偿不了旧住宅的报废。运输业的比重由 1966 年的 4.2% 降到 1976 年的 3.8%，商业比重由 1966 年的 10.3% 降到 1976 年的 7.0%，这就使产品的运输、流通更加迟缓，交通运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

这种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从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变化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1976 年同 1966 年相比，原煤产量增长 91.7%，达 4.83 亿吨，平均每年增长 6.7%；原油增长 499%，达 8,716 万吨，平均每年增长 19.6%；钢增长 33.5%，达 2,046 万吨，平均每年增长 2.9%；机床增长 186%，达 15.7 万台，平均每年增长 11.1%；农用化肥增长 117.7%，达 524.4 万吨，^① 平均每年增长 8.1%。这几种生产资料，除了钢以外，

① 化肥按含氮、磷、钾 100% 计算(下同)。

增长幅度都是比较大的。但从几种消费资料看，棉布只增长20.9%，达88.4亿米，平均每年增长1.9%；粮食只增长33.8%，达28,630万吨，平均每年增长3%；棉花、油料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有所下降。生产资料增长虽然比较快，但是由于重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增长过快；由于许多生产资料产品不对路、不合格；由于重工业生产的单位消耗量（能源、原料、材料）太高，因此，新增加的能源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大部分是为重工业本身“自我服务”，而没有能够有力地推动消费资料的增长（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而消费资料增长的缓慢，又拖住了生产资料生产发展的后腿。

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大大加重了新增劳动力就业的困难。五十年代初期大量出生的人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后期，已经开始进入就业年龄。从国营企业的情况看，一个重工业工人所需要的装备大约12,000元，一个轻工业工人所需要的装备大约6,200元，一个商业、服务业工人所需要的装备只有几百元。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自然大大减少了人们就业的机会。这种情况，加上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劳动者就业长期实行国家“统包统配”的政策，堵塞了劳动人民集体的或各别的自谋职业的門路，使就业的路子越走越窄，问题日益严重。这十年中，尽管上山下乡的青年有800多万人（这些人大部分未能长期稳定下来），到1976年，城镇待业人员仍达1,000多万人。

总之，在这十年中，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更加发展了，相对说来，生产资料这条腿更长了，消费资料这条腿更短了，本来已经倾斜的不那么协调的国民经济结构更加倾斜，更加

不协调了。

(三) 人民生活大量“欠帐”

我们不仅要考察国民经济的构成，而且要考察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与重工业过重的国民经济结构相联系，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使用上，存在着积累率过高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头三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处“夺权”、挑动武斗，许多工程建设陷于停顿、半停顿状态，所以，1967、1968、1969这三年，国家建设投资计划完成很差，积累率暂时被迫下降，这三年积累率平均为21.9%。到1970年，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有所恢复后，长期存在的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的左的思想，便又发挥作用，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从1970年到1976年这七年中，积累率都在30%以上，1971年竟高达34.1%。从建国三十年的实际经验看，按照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积累率25%左右比较适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24.2%），30%以上的积累率显然过高了。

在这十年中，不仅积累率过高，而且在基建投资的使用方向上，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过高，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过低。从建国以来的经验看，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生产性建设的（“骨头”）占60%到70%，用于非生产性建设的（“肉”）占30%到40%是比较恰当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性建设投资占71.7%，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占28.3%）。“文化大革命”十年，生产性建设投资占87.3%，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只占12.7%。结果，住宅、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保护设施等

方面大量欠帐，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困难。

积累率过高，不仅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降低了投资效果，而且压低了人民的消费。请看十年中人民的几种主要食物的消费水平变化情况：

1966—1976 年几种主要生活消费品
平均每人消费量的变化

	1966年	1976年
粮食(斤)	381	383
食用植物油(斤)	3.5	3.2
猪肉(斤)	14.1	14.5
棉布(尺)	20.0	23.7

注：粮食是贸易粮，不是原粮。

从上表看出，在这十年中，人民粮、肉、布的消费水平提高很少，食用植物油还有所降低。如果同建国以来历年的情况比较，1976 年每人平均消费粮食 383 斤，还略低于 1952 年(395 斤)的水平，比最高的 1956 年(409 斤)低 26 斤；食用植物油略低于 1951 年(3.3 斤)的水平，比最高的 1956 年(5.1 斤)低 1.9 斤；棉布略低于 1956 年的水平(25.9 尺)，比最高的 1959 年(29.2 尺)低 5.5 尺。

人民住房情况当时没有精确的调查。据 1978 年对 182 个城市住房粗略统计，每人平均只有 3.6 平方米，比建国初期的 4.5 平方米还少 0.9 平方米。据了解，1978 年的调查数字可能偏低一些，但大体可以说明住房拥挤的情况。“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加上片面追求生产速度、不顾人民生活的左的思想，尽管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但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这就违反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挫伤了

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更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文化事业经费很少，加之受到严重的摧残破坏，差不多耽误了一代人的培养，使许多行业产生了“后继乏人”的严重局面。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四）国家财政发生赤字， 经济效果大大降低

广大人民的日子不好过，国家财政的情况又怎样呢？“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面财政收入有了相当的增长，这反映了经济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支出增长得更多。十年中有四年是赤字：1967年由于全国的大动乱而发生赤字，最后三年，即1974、1975、1976年则连续发生赤字。十年共计，支出大于收入19亿元。这就是说，十年算总帐，是赤字财政。这些是帐面数字，实际上的赤字，远不止19亿元。因为在财政收入中，有些是来自国营企业生产并出售给国家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废品、次品而上交的税收和利润，实际上这种收入并不能代表相应的物资，是一种虚假的收入，用这种虚假的收入所作的开支是一种潜在的赤字；同时，由于人为地压低人民消费，应当开支的不开支，欠了帐，以后要还，这也为以后的财政发生赤字埋伏下根源。这些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逐步暴露出来。

人民生活被压低，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归根结底，是同经济效果降低密切联系的。“文化革命”十年中，国民收入的总额是有一定的增加的，而这种增加，主要是靠多投资、多用人、

多消耗能源和原材料来取得的；不是也不可能是靠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果取得的。

这里试举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材料如下：

1966—1976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几种经济效果指标的变化			单位：元
	1966年	1976年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	34.5	19.3	
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 税金和利润	46.6	29	
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	21.9	12.6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总产值	110	96	
每百元总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	23.5	36.9	

从上表看出：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1966年的34.5元，降低到1976年的19.3元，降低了44.1%；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税金和利润，由1966年的46.6元降低到1976年的29元，降低了37.8%；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由1966年的21.9元降到1976年的12.6元，降低了42.5%；而每百元总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却从1966年的23.5元提高到1976年的36.9元，上升了57%。这说明大量产品是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废品、次品。经济效果之所以大大降低，是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结果；也是企业管理制度遭受破坏、陷入混乱状态的结果。

*

*

1976年（准确地说，是到10月6日止）是“四人帮”反革命活动最疯狂的一年，是他们对国民经济破坏进一步加剧的一年，也是“四人帮”完全孤立、最后灭亡的一年。

在这一年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 1975 年刚刚有所恢复的生产秩序重新陷入混乱之中。“四人帮”对经济的破坏首先指向铁路运输。张春桥一再讲：“铁路是必争之地，一定要控制好”，“把运输、生产拖下来就是胜利。”在“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下，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和交通中心郑州阻塞了，东南地区的徐州、蚌埠，中南地区的武汉、南昌，西南地区的贵阳、昆明，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交通枢纽也都被阻塞了。全国经济的大动脉患了严重的“血栓症”。由于“四人帮”层层抓“右倾翻案”的代表人物，一度有所恢复的行政机构和经济管理机构又被“砸烂”，到处武斗频繁，内乱不止。许多地区工人不能正常地做工，农民不能正常地种田，商业人员不能正常地营业，学生不能正常地读书。1976 年 7 月 28 日的唐山大地震，造成 24.2 万人死亡，16.4 万人重伤，华北煤炭工业基地之一的唐山大部被毁，京津两市也受波及，更加重了经济上的困难。这一年，工业净产值下降 5.3%，其中钢产量由上年的 2,390 万吨下降到 2,046 万吨，一年减少 344 万吨。财政支大于收，赤字 29.6 亿元。“四人帮”这一年的破坏，加上 1974 年和 1975 年的破坏，大体估计，三年共损失工业总产值 1,000 亿元，钢产量 2,800 万吨，财政收入 400 亿元。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人类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谁要是阻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必然要被历史所否定，被人民所抛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党所犯的左的错误，大搞反革命复辟，制造政治混乱，竭力破坏生产，使广大人民生活不仅得不到改善，而且日益陷入困难的境

地。这就使“四人帮”丧尽人心，坠入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同年10月6日，党中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把“四人帮”永远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经济战线上面临的重大任务，不仅是迅速地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生活，消除十年来林彪、江青之流对经济造成的恶果；而且要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改革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发挥现有企业的巨大潜力。一句话，是要真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稳步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77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逐步认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努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